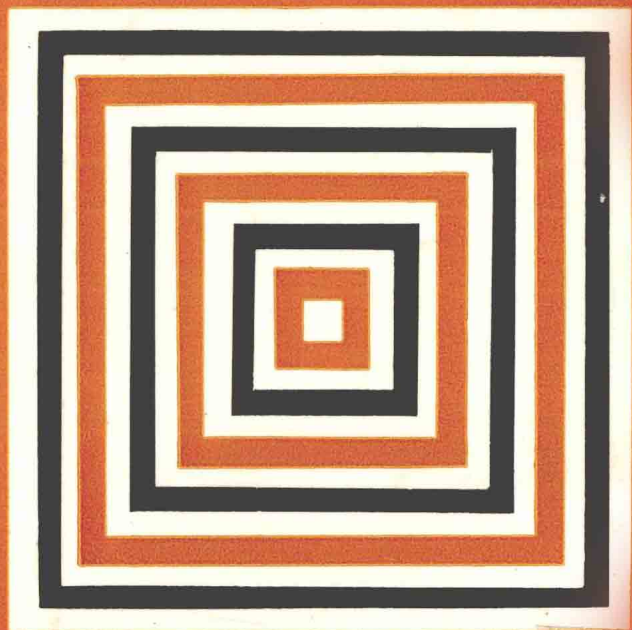


民國政治人物
第一集



著湘相吳 百一之書叢學文記傳

民國政治人物

上集

傳記文學叢書之100①(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民國政治人物上冊

每部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每冊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著者：吳 相 湘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1—36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目錄

黃克強與辛亥革命	一
宋教仁爲憲法犧牲	一一
蔡松坡爲國民爭人格	二一
「遁甲術專門之袁世凱」	三一
「慰庭總統老弟」之傑作	四一
五路神財梁士詒	四九
康梁與復辟運動	五九
「曠代逸才」楊度	六九
「項城勁敵」岑春煊	八七
陳炯明「造反出身」	一〇九
徐謙製造赤色政權	一二九
江亢虎與中國社會黨	一四五

民國政治人物

二

「今之寇準」黃膺白……

一六五

後記……

一七五

黃克強與辛亥革命

黃鶴樓是歷史上的名勝古蹟，是詩人騷客吟詠的好對像；自從民國十六年，改建爲首義公園後，更使它成爲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紀念聖地。登臨樓頭，一眼就可看到「放第一槍」的楚望台新軍營地；而革命元勛黃克強先生銅像矗立公園高地，不僅使每一遊客循階步上的時候要肅然起敬，更可以使人意識到黃先生與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密切的關係，這一設計佈置的適當，確實值得讚美。

就史實來說：當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時候，克強先生並不在當地，可是革命黨人的一切行動却可說是秉承克強先生的意旨，接受克強先生「遙制」的。辛亥年八月十二日（中華民國建元是壬子年的事，本文所述均辛亥年事，故紀時均仍依夏歷）克強先生在香港寄馮自由先生的信

於此說得很詳細，原文有云：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現人數已定二千左右……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以表面觀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力，似此人心憤發，倚爲主動，實確有把握，誠爲不可多得之機會；若強爲遏抑，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爲之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發起者事半功倍。總之此次居君所云專在必行，弟故許與效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

這信文中所謂「弦滿欲發」，「恐有魚爛」，並不是信筆引用成語，實在是當時情勢的寫真。因爲自「三二九」廣州之役後，各地清吏對於革命黨的防範搜查已特別的嚴密，對於新軍官兵的思想行動更加注意，鄂省新軍中瀰漫的革命思潮，是早被當局所覺察了，因此一方面將新軍隊伍分散調開，使其力量不能集中，一方面更多方訪求引線以搜捕新軍中的革命分子——就在克強先生寄出這封信後的七天（夏歷八月十九日西歷十月十日）克強先生還正佈置一切準備由香港北上滬漢的時候，武昌的新軍就因革命黨員名冊被清吏搜獲，不甘坐以待斃，也就等不及克強先生前來領導，即自動發難起義了。

當時起義的新軍人數並不算多，槍械也甚缺乏，但是在熊秉坤「放出第一槍」以後，當地的清吏自總督瑞澂以下都倉皇失措，終至棄城而逃，於是革命黨人因此而獲得成功。

武昌城完全爲革命黨人所掌握了，革命黨從此獲得了根據地；但革命黨的領袖孫先生尙遠在美國，黃克強先生也未到達漢皋，新軍同志們不得已祇好拖出協統黎元洪出來作頭目，擔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元洪上薩鎮冰書云：「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卽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祇得權爲應允。」可見元洪的出任鄂軍都督是如何的勉強，因此元洪和一般人都盼望黃克強先生早日到鄂領導。夏歷九月初七日（卽武昌首義後十八日）克強先生終於在萬千人的熱望下乘輪到達漢口，元洪得訊，就趕忙派人肩着寫上「黃興到」三字的高脚牌遊行街市，使全城軍民知道革命領袖到了，因此當克強先生與宋教仁（漁父）先生等由漢口渡江到達武昌時，自漢陽門江岸以迄軍政府，沿途店宅居民，都大鳴鞭炮以示敬禮，接着漢陽漢口各地也都鳴炮慶祝，軍民人等都因這一「革命實行家」的來到，感覺興奮，有些人甚至以爲革命大業可一蹴而成了。

但是，克強先生當時的心情，却是「感愧」多於「興奮」，這可於他自滬來鄂途中和譚石屏（人鳳）先生武昌首義詩中見到：「懷雖不遇粵途窮，露佈飛傳蜀道通，吳楚英雄戈指日，江湖

俠氣劍如虹，能爭漢土爲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而克強到武漢的當日，正逢清軍馮國璋挾新式槍炮猛攻漢口民軍陣地，民軍總數不過五千餘人，槍炮既缺，加以軍官人數不足，士兵亦多新募，因此未能阻擋久練的清軍，漢口市街大半陷於清軍手中。克強先生曾經在粵桂各地領導民軍與清軍作戰，深知清軍的內容。現在武漢軍民既是如此的熱望他的來臨，因此，在他到武昌與黎元洪晤談略悉軍情後，就滿懷着戒慎的心情，蒞臨漢口前線視察，計劃施行反攻，收復失地；但清軍竟制機於先，挾優勢炮火再度猛攻，民軍陣地終被突破，克強先生親臨最前線督戰也沒有能够挽回頹勢。九月十二日漢口不守，克強先生返回武昌，在軍政府會議席上，他分析挫失的原因說：「兄弟前日來鄂，即往漢口督隊，意欲反攻，恢復漢口，不料各隊新兵最多，秩序不整，加以軍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揮，至戰時因與兵士穿一樣服裝，辨別不清，亦極複雜，而兵士中在武漢附近所召募者甚多，一到夜間，即潛回其家，以致戰鬥員減少，各軍官因倉卒招募亦無從查實。重以各隊戰鬥日久，傷亡過多，官與兵均已疲勞太甚，毫無勇氣，且一聞機關槍聲，即往後退，蓋民軍軍火全在步槍，無一機關槍，每與敵接近，即較敵人損傷較重。民軍炮隊，又係山炮，子彈射出，又不開花，且射出距離太近，不及清軍管退炮效力之遠。但民軍衝鋒時極爲勇敢靈敏，清軍雖爲久練之兵，每聞民軍衝鋒喝殺聲即往後退，此民氣之盛，可恃者僅此耳」。這一番「知此知彼」的話語，使當時與會的人士獲得深刻印

象，大家都爲以非迅速加強軍隊的組織訓練不可，而統一指揮更爲首要急務，於是一致推克強先生爲戰時總司令。十三日晨，就在都督府前由黎元洪登壇拜將，儀式非常隆重，克強先生於拜受大旗關防令箭後，卽席發表演說云：「此次革命是光復漢族，建立共和政府，惟清廷仍未覺悟，派兵來鄂與民軍爲敵，我輩宜先驅逐出漢口之清軍，然後進攻，收復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

當克強先生決定就任總司令職務的先夕，在武昌的革命黨同志曾有人擬擁戴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也有人勸他不要接受總司令名義，以便迅速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出任中央首領的——總之句話，有些人很不願意克強先生屈居在黎元洪之下，但克強先生不計較這些，他極願親上前線領導軍隊驅逐清軍直搗幽燕，立一戰功後再行組織中央政府。這種實幹苦幹不計名位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仰的——有位曾參加中國革命的日本志士在他所著書中却頗責備克強先生不應持這種「禮讓」態度，以一堂堂的革命元勛而屈居「革命軍俘虜」（指黎元洪言）之下；這就未免太不了解克強先生寬厚恢宏的個性了。

十四日，克強先生在漢陽設立司令部，湘軍王隆中甘興典兩協隊也先後到達，與鄂省民軍協力佈防，憑襄水固守漢陽——清軍震於克強先生的威名和湘軍的聲譽，一時也未敢進犯，只派些間諜四出散佈謠言以破壞民軍軍心，但經克強先生努力督訓佈置的結果，不僅清軍狡計未得逞，二十六日早，民軍且制機於先，自漢陽渡襄河進攻漢口了；步砲猛烈的射擊，湘鄂軍齊頭並進，

民軍一路直前，逐步推進到達了玉帶門方面。翌日，又進占居仁門王家墩之線，清軍受不起這重大壓力，已準備乘車北遁——這時，民軍也因連續戰鬪一晝夜，感覺饑疲，克強先生遂下令各部隊暫就原陣地食飯後再行攻擊。不幸各軍大多是新兵，初經戰陣，不知戰鬪利害，一聞食飯號音，即羣往後爭食。湘軍第一協統見他部隊動搖，未察真相，即向後退。清軍窺見民軍隊伍紊亂，突改守爲攻，以機關槍集中猛擊，民軍因益惶惶，紛紛後退。克強先生嚴令停止退後，都不聽命，一時極度紊亂，清軍乘隙向我追擊，於是民軍各部隊遂以瓦解，勢如山崩；清軍節節前進，復占領玉帶門一帶，民軍擁擠渡襄河回漢陽，因秩序紊亂，人馬軍械損失頗重，元氣大傷，軍心不固。克強先生以功敗垂成，極感痛苦，幾不欲生，幸田梓琴（桐）先生等極力勸解，始復振作。

民軍官兵不能持久作戰的弱點，既爲清軍窺破，因此清第一軍統領馮國璋就定計以一部隔襄水牽制民軍，並用大砲時行擾亂射擊，另一部自蔡甸方面迂迴攻擊民軍側背，十月初一日早，自蔡甸前進的清軍在南岸嘴琴斷口至三眼橋一線與民軍發生接觸，民軍抵禦甚力，克強先生又親臨督戰，見有擅自後退的，即在陣前正法，因此士氣甚旺，與清軍相持三天。但民軍（無論湘軍鄂軍）究竟是新募之卒組成，各級軍官都未經過戰陣，洋槍重炮的怒吼聲殺傷力，常常使官兵後退，即如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就恐懼非常，潛藏民家，不敢上陣，統領如此，其部下軍官，也就不願身先士卒，每遇清軍猛烈炮火，第一協部隊就逗留不進，湘軍第二協見第一協如此，也聞風效

尤。當十月初三日仙女山美娘山十里鋪戰鬪激烈時，克強先生親臨前線，督催湘軍前進，但竟四處找不着王隆中甘興典二統領，在隊軍官，俱不願負責——由是可見當時各省新軍組織訓練的鬆懈，臨陣當然難以持久，而清軍又集中重炮及機關槍猛射，因此更使民軍陣地萬分危殆，不幸這時（十月初六日午）湘軍第一協第二協竟又不遵命令擅自分向武昌及漢陽鸚鵡州退却，其他部隊也受牽動後退，克強先生再三傳令不准後退，並將後退者斬首二十餘人，但已不能阻止；清軍見我陣線動搖，即乘機前進佔領十里鋪；漢口橋口一帶清軍復乘隙渡河助戰，更使民軍陣地，感受重壓。

克強先生眼看這種情勢痛憤極了，在昭忠祠司令部對重要幕僚痛哭陳說：「戰事一敗至此，官兵無一人用命，眼見漢陽快要失守，我實在無面目見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謝同胞」。大眾聞言，均爲泣下，最後田梓琴先生起來哭勸克強先生說：「你一身關繫大局安危，死不得！死不得！況勝負是兵家常事，請急收容各隊伍至漢陽城內防守，背城一戰如何？」

克強先生要以身殉漢陽的消息，很快地傳到武昌，黎元洪聞訊，趕着派人到漢陽慰勸，挽請先生渡江休息，於是克強先生就在衆人勸擁下於這天（十月初六日）午夜回到武昌都督府。

十月初七日，漢陽失守——自九月十四日克強先生至漢陽開始籌戰守至此共計二十四日——這二十四日的時間是非常珍貴的：設若不是克強先生毅然以戰守自任，憑襄水與清軍相持，牽制

清軍力量，恐怕清軍早已由海軍的掩護經青山以攻襲武昌了。當時武昌守軍單薄，若有不虞，民軍失此根據，其影響將如何？因此，漢陽的固守二十四日，是已達到戰略上的要求了——而最重耍的是有了這二十四日時間，宋教仁先生才有餘裕加強蘇浙聯軍的組織以攻略南京。

原來克強先生自港抵滬後，即與宋教仁先生等商定攻略南京皖蘇以響應武昌的方策，分途派人策動進行。九月初七日，宋教仁先生隨克強先生到武漢一度視察當地情形後，又復東下，九月廿四日，舟抵南京，才發現原來約好的新軍同志竟被清軍張勳部分途搜捕或調開了，原定計劃不能實行，教仁先生祇好趕往鎮江上海再為佈置進行。結果，十月十二日（即漢陽失守後五日）南京終於為革命軍所有了——如果沒有漢陽的堅守，宋先生及蘇浙同志那有餘裕時間以籌劃攻略南京呢？由此可見克強先生在陽夏戰守的功勞，而他本人却因挫敗欲以身殉，更可見他責任心重，不成功即成仁，真是革命軍人的模範。

南京的攻略成功，使革命軍與清廷對峙形勢大變，因此，清廷不得不求和議。從此，政治重心移於上海南京，武昌首義的志士完成他們的任務了。

當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在上海集會時，曾選舉克強先生為中央軍政府大元帥，黎洪元為副元帥；嗣因克強先生堅辭，後來又改選黎為大元帥，克強為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務；但克強先生始終不允接受，他不願因個人地位而引起政治上的糾紛。一直等到國父中山先生回國，南京臨時政

府成立，國父提請參議院通過任他爲陸軍總長，他毅然受任，因爲他願意以身率教，將負責任、明禮義、知廉恥的精神播佈在中華民國陸軍每一個人。

宋教仁爲憲法犧牲

「晚色侵江白，輕舟發夏陽，潮聲隨岸遠，山勢送人忙。
大地風雲鬱，長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處是瀟湘？」

這是桃源漁父宋教仁先生於民國二年二月自漢口東下上海時的詩句，也可說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後的吟詠；因爲在當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凱派人刺殺於上海滬甯車站了。

宋先生死時不過三十二歲，他是生於民國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緒八年壬午歲（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國傳統統計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壽。

宋先生雖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歷程中，却已經對國家民族盡了他最偉大的貢獻。在國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頁。

蔡子民元培先生說：「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會，會旨雖有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諸義，而會員大多以驅除韃虜爲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若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漁父先生其最著者也」——這是蔡先生親眼見聞的寫實，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語。革命歷史的記載更多可以證實這一說法的。原來自民國紀元前八年華興會在湖南起義計劃失敗以後，宋先生就與黃克強先生等先後東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殺，一以作負笈求學的打算——當時留日學生界幾乎是以學習軍事爲風氣，因爲大家的認識，都以爲要「富國」必先「強兵」，並且要想推翻腐敗的專制政權，也必須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東京時，也深爲這一風氣所感染，曾經報名學習兵式操和馬術，以爲投考軍事學校的初步；但是經過四五月以後，先生的計劃變了：他決心肄習政治經濟學，這是他涉獵各種學科和研討立國的根本大計，又經中日友人研究他的個性興趣以後的結果——當時友朋多稱許先生頭腦細密，秉有天賦的組織力和經國的才能——從此宋先生就進入法政大學（後改入早稻田大學）。努力學校功課的餘暇，就潛心翻譯各國政治制度經濟實況的書刊，一方面個人藉此研究各國政治經濟的優劣得失，一方面將它介紹給國人研討。並且譯述稿費所得，不僅可以添購新書刊，有時還可以濟革命黨費用的不足，例如先生譯述的日文名著財政學一書，它的稿費曾使同盟會渡過經濟困窘的難關。

宋先生這樣苦學的結果，使他對革命成功後建國的規模計劃有所得於心，當辛亥春，黃克強